

從中國政治哲學思想 論我國社會指標的建立

賴 澤 涵

一、引 言

追求「均富」乃是人類文明發展以來的最高目標之一。而其思想，中、外的思想家均曾討論過。惟歐、美在二次大戰前所討論的似乎不及我國來得系統。我國自孔子以來的「大同社會」境界一直為中、西思想家所嚮往的最高目標，此一理想經孫中山先生及蔣公中正先生的闡釋與提倡，成為我國推行社會福利政策最有系統的指導方針。

社會貧富差距的造成大抵與土地可自由買賣有關。蓋有積蓄者無不購買土地以置產，並以之傳留子孫，結果無土地者只得淪為佃農或從事其他行業。在傳統的社會裏，土地即財富。土地除是財富之外，科舉制度似乎對他們也較為有利。蓋參加科舉須費時花財力，如果沒有財產者似乎較難準備應舉。這就是我國仕宦之家很少不與地主分開之者，社會上「地主」與「紳士」也因此往往並舉稱呼他們。

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之後，兼併之風隨之而起，結果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無立錐之地」，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歷代的所謂明君或有為的政治家（如王安石等）沒有不想用限田政策或改革土地問題的，然而土地問題甚大，絕不是一紙命令可以解決的，這就是我國歷代的土地改革收效甚微的原故。復次，地主階級與仕宦之家易為自己利益（仕宦之后無不以購置土地為終老告鄉之準備）形成集團，反對土地改革的措施，這就是我國歷代土地改革失敗的主因。

細考「均富思想」的來源主要在於貧富的懸殊，「不平則鳴」之故，先哲以「不均」可能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危及社會秩序，甚至大亂，危及生命，乃呼籲明君早為綢繆，所以先哲的均富思想來自百姓之痛苦，因此為在位者籌劃消彌大亂之方，其基本動機乃在於「仁」的發揮。

先哲對如何才能建立和諧均富的社會雖然都沒有皇皇的大著論述，但他們的理想到今天還是各國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

儒、法兩家為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故本文所論及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想亦以他們為主，此並非其他諸子所談論的不重要，只是他們的著述不及儒、法兩家之稍具系統而已。

復次，社會福利措施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已逐漸付之於行動，且以國家之力全力推行之。此點在我國傳統的政治思想家，只有寄望「明君」出現，一般民衆對之也無任何之約束力，而且先哲之理想社會之藍圖只是大而化之，未能詳其具體實行步驟。

孫中山先生終身從事革命工作，他在世時對歐、美的社會病態有深切的體察，而他對先哲所描述之理想社會又極為嚮往，乃融合中、西思想家的理想社會，並採擇歐美政府所作之改革方向，提倡民生主義，以為中國未來社會建設方針，所以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兼含中、西思想之優點，且較實際可行。

中山先生不幸在民國十四年以六十歲之齡病逝，其思想惟有靠其同志或追隨者的發揮，而其社會建設之理想終有蔣公中正先生「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之闡揚，使之較為具體化，故中國未來社會指標之建立應參考先哲之大同社會思想及歐

美先進國家所行之具體社會指標措施。本文探討之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只以孔、孟、管子，孫中山及蔣中正諸人爲代表，希望能由他們之思想釐出未來中國社會指標建立的方向。

二、儒家之大同社會思想

儒家思想之最大特色乃在爲人民——即「仁」的發揮，以人民爲政治的主體〔註一〕，發揮「民爲邦本」的思想。儒家最具代表的人物即孔、孟。

孔子（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爲殷遺民貴族之後〔註二〕生於春秋戰亂之世，一世栖栖皇皇，冀能爲國所用，以展其才而不得，退而著書教學，開我國平民講學之始，其子弟將其言論輯爲論語一書。今吾人於此書及禮記禮運篇可略窺孔子之理想社會。

孔子之理想社會，簡言之，即要社會能「富」、「均」、「教」，即人民生活富庶，貧富無不均，且能受教育。〔註三〕所以孔子希望有國者能因人民之利而利〔註四〕，使民能足食，使民能富。〔註五〕然而民富而不教，甚或有貧富不均的現象，則無法使社會和諧。因富而不教則易生驕，貧者易生大憂，而大憂則易爲盜。〔註六〕驕，奢，盜的情況，社會就易動亂，天下不能太平。

孔子既感富而不教及貧富不均之弊，乃倡「富」而「教」，並力主「均」財富。「均」字當如何解呢？漢代董仲舒對孔子「均」的註解是「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註七〕這該是「均」字最好的解釋。

惟孔子之理想社會尚不只求政治的清明而已，他尚有最高理想——天下爲公的「大同世界」。孔子希望政治上能達此種境界，使「人能盡其才」——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壯有所用，男有分，女有歸。」此即教育功能的發揮。復次，孔子希望大同世界時能「物盡其用及貨暢其流」即貨不必藏於地，力不必爲己，如此使民能利用自然資源，人人能工作，人人能就業，而達富足之境，而對「矜、寡、孤、

獨、廢、疾者」國家能有社會福利措施使他們都有所養，社會上無一不被照顧，「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一生到死，都能受到國家社會的照顧。那就是政治上，人盡其才；在經濟上，人人有業就，貨暢其流；在社會上，因種種福利措施，無分配之不均；教育上，從小即可受教育，有發展才能的機會。如此使社會上充滿「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偉大愛，生活也不必受到盜、竊、亂賊的威脅，每日可過安適及夜不閉戶的生活，從生到死（from cradle to the grave）都有了照顧，這豈非今日世界各國社會指標的理想？故儘管世界各國社會指標內涵不一，惟其目標不外孔子之「富」，「教」，和「均」，即達「民有」、「民享」之境界。〔註八〕

孔子以後的大儒爲孟子。孟子（西元前三八五——三〇三？三〇二？）爲戰國時鄒人。爲我國最能夠發揮「民貴」的大哲〔註九〕，以人民爲一切施政或政治的思想的根本。〔註十〕我國的民本思想到孟子發揮到達至極的境界。

孟子一書對養民之事闡述很多，而盡心、離婁、梁惠王上及滕文公上諸篇最爲有系統且有條理，可以說發揮孔子之「均」、「富」和「教」的理想。

孟子之政治社會思想還是起源於當時社會的貧富的不均。例如當時的富人過窮奢極欲的生活，但却毫無悲天憫人之心。仕宦之家是「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而其家裏却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註十一〕一般的人民平時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真是民有饑色，終身難得一飽。如果天時不利，而政府又剝奪其耕種時機，那麼他們的「父母只有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的地步了，〔註十二〕一旦遇到凶年，老弱只有「死於溝壑，壯者散而求食四方」，沿途自然是餓殍了。因此，孟子見到當時的王公貴族不養民行王道，只知以暴力或霸道得天下，自然不無感慨了。

爲了匡正當時爲國者之短視與偏差，孟子乃到處遊說當時的君王（如梁惠王等），告訴他們治國的大道首在使民能養致富。能養的方法在他看來也不是很困難，只要能制田里（即「均」之意），教百姓樹、蓄，不奪農民耕種時間而已。〔註十三〕

果能如此，人民因三年之作有一年之蓄，那麼一般人民到五十歲時可穿衣帛，七十歲時就可以吃肉了，那就是「樂歲終身飽，凶年可免於死亡」的境界。假如不能使人民養生送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樂歲要終身苦，凶年不能免于死亡，那麼百姓怎還有心去接受禮義的薰陶？〔註十四〕由此看來，孟子特重人民之基本生命——即人權，政府有「絕對養民安國之義務」〔註十五〕，否則「上慢而殘下」則人民可「反之以不親上死長」，並與國君為敵了。

所以使民富〔註十七〕，那麼，人民因有恒產而有恒心為善〔註十八〕，然後使之受教。人人受教育，明人倫及仁義之大道，此即孔子「富之教之」之義〔註十九〕如此庶可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註二十〕，而矜、寡、孤、獨皆有所養〔註二十一〕，則天下之民心歸矣而可王天下。

由孔、孟的思想看來，兩者實皆以「民」為中心而發揮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即他們的基本思想在能重「人權」。政府重視人民的生、老、病、死（養生送死）諸事。而「富」、「均」、「教」、「大同世界」則為其最高的理想社會，這與二十世紀世界各國推行之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觀念頗能一致。

三、法家之均富思想

法家雖然不是中國的正統思想，然而其理論頗能適合統治階層的需要，這就是我國歷代表面上看來儒家得勢，實內皆用「法」以治的原故。

法家論均富思想較着者的為管仲。〔註二十二〕 管子一書按學者之考證為後人之纂集非管子一人所作，〔註二十三〕惟管仲相齊頗久，似可反應其思想。

管子一書涉及論「富」、「均」、「教」、「養老」者如牧民、權修、輕重用、國蓄、五輔、禁藏、撥數等篇均極詳細，具有價值。

管子相齊桓公多年，故於治道，多少相當了解，彼亦感人民貧窮，貧富不均的不易治。〔註二十四〕因貧困使百姓「危鄉輕家」無所不為，〔註二十五〕而貧富不均之害在使天下法令不能推行。故侈靡篇有言：「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

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以貧富不齊也」。爲了使貧富不致太過懸殊，管仲的方法乃將工商之利收爲國有〔註二十六〕，政府並控制貨幣及鹽鐵數項公賣，以防不肖商人之操縱市場。〔註二十七〕至于農民政府則應給耕農耕種所需之貸款與工具。〔註二十八〕由政府控制一般重要生產交換業務，使商人無法居奇操縱，貧富懸殊之現象在他看來是可避免的。

政府除供給農民農具或貸款外，也須鼓勵他們努力開闢田野，努力耕作〔註二十九〕，如此農富，商人又不得居奇操縱，那麼治理也較容易了。因爲「民富則安逸重遷，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易治也。」〔註三十〕百姓因「食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矣。〔註三十一〕

人民富足之後，必須以教育開導人民使明國家法律，如此百姓不至於產生暴亂矣。〔註三十二〕

至于社會上無助的人們，在管子看來政府必須負起責任來，〔註三十三〕這與儒家所要行之社會救濟與福利政策接近，如此則「民富君無與貧」了。〔註三十四〕

由此看來，管子治國之基本理論是在爲統治者立論，希望由國家之力做好富民等措施，以便國家法律能夠推行。以國家之力消滅貧富之不均，使民富足。若民衆衣食不足，社會就會發生侵奪懷怨的現象。而「民富則易治也」，〔註三十五〕孤苦無助者皆由國家之力扶助之，人民基本生活安定之後，然後引導人民向「四維」（禮、義、廉、恥）的境界，最後才「申之以憲法，勤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如此百姓才會心悅誠服，暴亂之事才不致發生。〔註三十六〕所以管子的學說還是離不開法家的行法，〔註三十七〕惟其基本主張還是以經濟爲首要，而管子的牧民篇實即「中山先生所說的養民之意」。〔註三十八〕

四、孫中山先生之綜合中西理想社會之思想

中山先生一生在歐美的時間相當長久，對當時歐美的社會思潮及社會病態均曾細心的考察過，尤其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貧富相差懸殊極爲注意，因此，他對

中國未來社會建設藍圖亦以能防患歐美社會病態于未然為目標，同時，他又能把我國先哲理想社會的理論加以整理，此所以我們說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建設指標實兼有融合中、西社會學說的優點的原故。

中山先生的理想社會為一「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大同社會」，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富強最快樂的國家。〔註三十九〕

中山先生的社會建設理想早在同盟會時期即有一明白的說明，〔註四十〕當時革命尚未成功，但他已認為革命成功后中國應努力的方向，譬如說，他認為地價之增價應歸國民所享，而不是地主階級。國家應使「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不獲其所」，〔註四十一〕由此可知 中山先生的第一目標還是求全國人民的「富」，此與孔、孟、管子的社會建設理想頗相吻合。

到了民國成立， 中山先生把其社會建設的理想作較有系統的闡述，尤以民國元年他所作的演講，可清晰的看出 孫中山先生所希望建立的社會了。他希望全國國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從五、六歲至二十歲止），為日後參政之準備，五十歲以後由國家供給養老金，對社會上無能力自謀生活或子女過多的由國家資養，〔註四十二〕其實這就是教育機會均等和當今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的重要內涵，亦即近代社會指標重要的目標。

然而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並不只是以達到這些為目標。為滿足它最重要的還是要求「均貧富」，即分配財富，「把不平等的事打到平等」，〔註四十三〕沒有大富人和大窮人的分別，一般人都未必為生活而煩惱，如此，國家設立各種不同學校以教育〔註四十四〕，國家設立很多工廠使人人有工作做，至于其他無依無靠者由國家贍養，〔註四十五〕以達社會上之真平等。

除上述之養、教、濟貧外， 孫中山先生的社會設施還包括保育、養老、救災、救濟殘廢、失業、衛生與醫院設備及公共娛樂如公園的設立等項，〔註四十六〕惟有如此，才能達到「自由、平等、博愛」的境界，即大同世界。

至於政府舉辦如此多的福利措施，經費該從何處來？ 中山先生認為可由公營

事業或土地的歲收，增值的地價，山林川澤，礦產水利的利益來興辦。〔註四十七〕

這些福利事業照中山先生之意應由地方政府經營，換言之，即中山先生所主張土地漲價歸公，而其利益應為全國人民所共享的原則。〔註四十八〕

由上面的概述，可知中山先生的理想社會還是繼承孔、孟的大同社會思想，故他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大同主義」。〔註四十九〕惟中山先生不僅只注意到物質生活方面的需要，他尚注意到娛樂方面的精神需要，此點與目前各國的社會指標亦有吻合之處。

五、 蔣公中正理想社會之具體計劃

蔣公以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只談四講，而第四講也不過只談衣、食等二大需要而已，至于住、行兩大需要則在實業計劃中討論過，惟獨育、樂兩大人需要未能有系統的討論為憾，乃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表其對育、樂兩大問題的看法，此即其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的由來。〔註五十〕此書實為中山先生理想社會最具體的討論，從養生到送死，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內容均有極詳盡的發揮，因其影響我國未來社會指標的建立，所以我們約略的加以討論。

蔣先生此書最可貴之處即把二次大戰以來各國所推行的社會福利觀念加入並融合於民生主義，使其更為具體可行。譬如生育和養育，他所論及的不僅指醫院而已，他還認為政府應設有教養院、保健院、托兒所，甚至為心理殘缺人民的照顧。至于死亡，他也嚴肅的加以討論。他認為喪事應哀而不傷，但又需能慎終追遠，改革陋俗，因此，為了環境衛生及死者，他認為每市每鄉應設有公衆的殯殮場所及公墓的設立。〔註五十一〕至於樂的方面，除中山先生所提及的公園、娛樂之外，他還注意到心理的康樂，因此，對文藝、音樂、歌曲、美術、電影、廣播、宗教等均有極精確的發揮，他不僅要政府充實內容且要提高其品質。〔註五十二〕此外，他對身體的康樂（如體育、健康習慣，必具技能如駕駛、操舟、游泳等）也都有極系統的分析，至于教育的方針，任務設施和內容等也都有極為精闢的批評與主張，

所以整書的目的，就在充實人生生活的內容，以達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和「太平世」的境界。〔註五十三〕

六、結 論

如何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指標？我國從先哲到 蔣公都有一脈相承的理想，先哲們看到一國治亂的根本在於是否能實行「均富」政策和供給完善的教育。這些看法與當今社會指標的內涵是有一致性的〔註五十四〕，而孔子的大同思想（內容包括有齊家，振濟孤苦，經濟的均富，社會秩序的維持，教育的供給知識及品德的陶冶等）更是今日世界各國社會學家所要建立社會指標的重要內涵。

惟我國過去社會思想的倡議者，大部分為不在位的知識份子，因此他們的言論也很少被採用，而他們也只能盼望明君的出現（如孟子所說「明君制民之產」）來實現他們的理想。然而明君在我國史上並不多見，而且所謂明君也不過只是以「省稅薄歛，輕徭役」，而已。政府的功能純視統治者的賢愚而定，因此，歷代社會福利或社會救濟措施大概以無計劃者較多，例如天災人禍的救濟或減稅，民間亦以義賑為主，以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故我國傳統社會的社會政策以消極者居多。

細考社會政策，早期在歐、美各國亦以救濟孤苦為主，假如英國一六〇一年伊莉莎白的「窮人救濟法案」，其規定教區有救濟窮人之責，〔註五十五〕從一八九七到一九三〇年，西歐各國均在推行社會救濟和安全措施，德國更早。到一九三四年美國 Franklin Roosevelt 總統宣佈政府有一定的責任使用其職權和資源以應付社會問題，並認為一般人有經濟、政治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註五十六〕此種明白把社會福利當做國家應有的責任應是創舉，而這以國家之力來創造幸福社會的意旨與 孫中山先生及 蔣公的看法一致。由此可知過去政府被認為應該少管事，凡是管得愈少的政府愈是好的政府勢將成爲過去。由目前世界各國所做的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和安全制度看來，國家要做和要管的及花費恐怕愈來愈多，責任愈來愈重，這是先進工業國國家功能看法的轉變之一。〔註五十七〕

復次，過去政府的功能似乎均在有形的或物質上的救濟，教育被認為只是陶冶品格道德，將來便於治理的工具，目前世界的社會指標已注意到積極的和精神的實質意義上，例如不僅有房子住而要住好的房子，並有良好的環境（社區）。政府也在幫助每個人或每個家庭達到他們所需選擇的東西。教育的功能在使才能不致被湮沒等等〔註五十八〕，這在孫中山先生及蔣公均已注意到，且要求以後政府的措施朝這方向努力。

然而儘管政府責任愈來愈重，未來我國社區及民間團體參與社會指標的制定也不能不注意或予放棄。事實上，社會工作應由社區直接參與，才能更有效果，此故歐、美社區地位愈來愈重要的原因。〔註五十九〕惟有經過社區這些輔助機構或其他代表的參與才能使社會指標的內容做得有效率及有責任的發揮。〔註六十〕

過去，先哲對如何因應社會建設的經費均很少提及，這要到孫中山先生才以具體的土地增值稅來做社會建設工作，惟我國在民國四十年以前政治不穩，中山先生的理想一直不能實現，直到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國民黨九屆二中全會制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強社會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的生活實施方針」時始規定具體的財源，當時決定以推行都市平均地權，地價重新申報後，將地價稅超收全部作為社會福利基金。〔註六十一〕民國五十五年的第一期社會福利計劃財源即根據此項決定，此後民國五十七年，五十八年，和六十五年均強調都市地漲價歸公用途〔註六十二〕，惟實行上有不少人不認識社會福利的積極功能，只認為是單純的消耗，因此常將經費挪至他用。〔註六十三〕這點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總之，我國的政治思想是希望政府能使人民「養生送死」，「能均富」，並能使每人能夠受教育，社會的救助應及於孤苦殘廢無助的人民。政府應使每個人都有職業，社會秩序能達夜不閉戶的境界的大同社會。因此，我們如何計劃使其能具體化實行並採取歐美先進國家實際實施的內容，研討其實行過程中所發生的障礙或難題，例如我們不可使社會福利變成養成人民的惰性，以及工作人員的浪費公帑等。〔註六十四〕做為我們實行社會指標的參考。目前我們並不缺崇高的理論，我們所

需要的只是如何採取他人的優點並改進其缺失，並發展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實行方法與理論，並加緊實行。我們一方面要加重政府責任，一方面也要強化監督政府的民意機關，使他們發揮權力，引導政府實行社會指標的方向，優先次序和經費的合法開支等等，這實在是我們釐定社會指標很重要的課題。〔註六十五〕

爲了有效實施和推行社會福利的工作，我們必須確認它是一項永久性而非浪費的工作，它是一個尊重人權，實現「民胞物與」的觀念，它是一個實行 from womb to tomb 的方針，因此，爲了能有效的推行社會福利措施，我們必須根據先哲的「富」、「均」、「教」的原則釐定細目，參考先進國家的社會指標內涵，及早制定一套健全的社會指標及其實行的重要方案〔註六十六〕，尤要者，我們要確立「社會工作人員」制度，使其能以「個案工作」方法辦理工作，以利均富社會的實行。〔註六十七〕

註 釋

- 〔註 一〕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六十六年版），頁一九四。
- 〔註 二〕同上，頁五二。
- 〔註 三〕見論語之子路篇、季氏篇，孔子家語，卷三，賢君第十三。
- 〔註 四〕見論語堯曰篇。
- 〔註 五〕見孔子家語卷三賢君第十三；秦學明「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十六年，四月一日），頁四七。
- 〔註 六〕林桂圃「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十六年三月一日），頁一九。
- 〔註 七〕引自林桂圃「孔子的政治思想」，頁一九。
- 〔註 八〕蕭公權，頁一九四。
- 〔註 九〕同上，頁一九四。
- 〔註 十〕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一四五。
- 〔註十一〕孟子梁惠王上。
- 〔註十二〕同上。
- 〔註十三〕同上。
- 〔註十四〕孟子滕文公上及梁惠王上。
- 〔註十五〕蕭公權，頁九。

〔註十六〕孟子答鄭穆公問，蕭公權，頁九。

〔註十七〕孟子盡心篇：「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註十八〕孟子梁惠王篇：「無恒產而有恒心產，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

〔註十九〕孟子滕文公篇；馮友蘭，頁一五二——一五三。

〔註二十〕孟子梁惠王上。

〔註二一〕孟子梁惠王篇「此四者（即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可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堯獨。」

〔註二二〕管仲生年不可考。法家之荀子，亦主富民，如王制篇「王者富民」，富國篇「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漠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具矣。」可見荀子之思想與孔、孟頗爲接近。見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台北：周金聲著作發行所，民五九年），頁九一。

〔註二三〕賀凌虛，「管子的治國方略」，中國歷代政治理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七年），頁四八。

〔註二四〕管子五輔篇「貧富無度，則失，」侈靡篇「甚富不能使，甚貧不能聽」。

〔註二五〕管子治國第八。

〔註二六〕蕭公權，頁二〇八——二〇九。

〔註二七〕管子國蓄七十三，海王第七十二。

〔註二八〕管子輕重丁第八十三；賀凌虛「管子的治國方略」，頁五六。

〔註二九〕管子五輔篇。

〔註三十〕管子治國篇。

〔註三一〕管子牧民篇。

〔註三二〕管子權修篇。

〔註三三〕管子五輔篇「奉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事禍喪，…衣凍寒；食饑渴，匡貧憤，振罷露，資乏絕…」禁藏篇「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

〔註三四〕管子山至篇。

〔註三五〕管子治國篇。此與慎子（無卒年月可考）之語亦有相通之處，慎子亦以富民爲國家第一要務。慎子有言：「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輕家則危鄉，危鄉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爲國之道，在富民而已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見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頁二五八。

〔註三六〕管子權修篇。

〔註三七〕管子牧民篇「刑罰不足以畏其義，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 〔註三八〕周金聲，中國經濟思想史，頁一七三。
- 〔註三九〕孫中山先生「革命在最後一定成功」，「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十二年）頁六一〇，六七〇——六七一，六七七——六七八；葉青，國父育樂兩篇研究（台北：中國政治書刊社，民四三年），頁四二。
- 〔註四十〕「同盟會宣言」見張其昀著，黨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八年），冊一，頁五九——六〇；周金聲，頁八九五；國父全集冊二，頁二二〇。
- 〔註四一〕周金聲，頁八九五。
- 〔註四二〕周金聲，冊三，頁八九九——九〇〇。
- 〔註四三〕孫中山先生「革命軍不可想升官發財」；「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冊二，頁六四四，六七〇，六七八。
- 〔註四四〕孫中山「地方自治實行法」，國父全集冊二，頁一七。
- 〔註四五〕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國父全集冊二，頁六七〇——六七一。
- 〔註四六〕崔書琴，三民主義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三年），頁三九七；孫中山先生「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國父全集，冊二，頁二九八——二九九。
- 〔註四七〕建國大綱第十一條在國父全集民六二年，冊一，頁七五二。
- 〔註四八〕建國大綱第十條，國父全集，冊一，頁七五二。
- 〔註四九〕同上，民生主義第一講，國父全集，冊一，頁一五七；林桂圖「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六年三月一日），頁二一。
- 〔註五十〕蔣中正，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國父全集，冊一，頁二二三。
- 〔註五一〕國父全集冊一，頁二四六——二四七。
- 〔註五二〕同上，頁二六九——二七五。
- 〔註五三〕同上，頁二八一——二八二。
- 〔註五四〕Kenneth C. Land and Seymour Spilerman eds.,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pp. 21-24.
- 〔註五五〕參 "Welfare and Security Progres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75, p. 743.
- 〔註五六〕R. 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1974), p. 5.
- 〔註五七〕羅時實，三民主義與當代政治趨向，（台北：華岡出版社，民六三年），頁一一——二一四。
- 〔註五八〕Morris Janowitz,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Elsevier, 1976), preface XII; R. C. Birch, p. 3.
- 〔註五九〕Birch, pp. 6-7.
- 〔註六十〕Janowitz, preface XII.
- 〔註六一〕談益民，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五四年），頁九。

- 〔註六二〕邱創煥，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制度概要，（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頁二五二六。
- 〔註六三〕白秀雄，社會福利理論與實際，（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頁二——三。
- 〔註六四〕邱創煥，頁一一——一二。
- 〔註六五〕Janowitz, preface XII.
- 〔註六六〕劉脩如「建立社會安全改善國民生活的方向」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二二。
- 〔註六七〕同上。

參考書舉要

(一)中文部分

- 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之部）台北縣：藝文印書館，民六五年。
- 孟子注疏 台北：中華書局，民五七年。
- 管子 台北：中華書局，民六二年。
- 孔子家語 台北：中華書局，民五七年。
- 蕭公權 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民六六年。
- 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台灣影印本，不著年代。
- 國父全集 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二年。
- 蔣中正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國父全集第一冊二二三——二八三頁。
- 葉青 國父育樂兩篇研究，台北：中國政治書刊社，民四三年。
- 張其昀 黨史概要，第一冊，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六八年。
- 周金聲 中國經濟思想史，台北：周金聲著作發行所，民五九年。
- 崔雪琴 三民主義新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三年。
- 建國大綱 在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六二年。
- 羅時實 三民主義與當代政治趨向，台北：華岡出版社，民六三年。
- 談益民 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五四年。
- 邱創煥 中國社會福利思想制度概要，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
- 白秀雄 社會福利理論與實際，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六年。
- 劉脩如 「建立社會安全改善國民生活的方向」，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二〇——二四。
- 秦學明 「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十期（民六六年四月一日），頁四五——四八。
- 賀凌虛 「管子的治國方略」在歷代政治理論。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六七年，頁四七——七二。
- 譚振民 「均富的理念與政策」東方雜誌第十二卷第七期（民六八年一月一日），頁三二——三九。

林桂圃 「孔子的政治思想」，東方雜誌第十卷第九期（民六六年三月一日），頁一八——二二。
龍冠海 「孟子的社會思想」，東方雜誌第九卷第九期（民六五年三月一日），頁三二——三六。

(二)英文部分

Encyclopedia Britanica, 1975.

Kenneth C. Land and Seymour Spilerman. *Social Indicator Model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5.

R. 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Longman, 1974.

Morris Janowitz. *Social Control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Elsever, 1976.

李錫銀評述

賴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比社會指標更基本的問題，即社會環境（social milieu）的問題：西方社會和社會學界在近百年來所追求的服務平民（masses）的觀念，中國早在二千年來即已不斷強調；由此我們可看出，中國的政治哲學比西方優越的地方，就是對民本思想的肯定。但是由於缺乏方法學與方法，所以雖然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在強調平民社會（mass society）的民本觀念，卻無法提供一個可資運作的理論架構。例如：貞觀之治一直為我們所欽佩，但是貞觀之治下的人民生活情形究竟如何？又如蒙古統治下中國的人民生活又如何？缺乏這種運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我們就談不上瞭解我們的社會狀況。又如我們已經反共數十年了，過去在大陸時大都著重於軍事和宣傳上的反共，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因素即產生共產黨及使共產黨壯大的社會環境。我們可以說，日本的侵略及美國的政策只是導火線而已；真正導致共黨竊據大陸的因素，恐怕是社會環境的因素。從社會學的觀點，如果徒有關心社會群眾福利的概念而缺乏運作化能力，對解決群眾的問題是幫助不大的。

東、西方思想的差異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封建制度瓦解時間的不同。文藝復興後，封建貴族為了抵抗神權，提出了平民的觀念（如洛克的學說等），用平民的觀念來打擊神權，因而建立了所謂「世俗化」的民族國家。平民逐漸做生意，變成中產階級；等到力量壯大後，又和貴族發生衝突，終於發生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工業革命後，再度形成平民與資本家的對立。此後一、二百年，社會學家稱歐洲歷史為維多利亞時代階級鬥爭的發展史，社會學也在這種階級的鬥爭的背景中，逐漸發展壯大。至二次大戰的二、三十年間，社會學才發展到一個高峯。所以從西方社會學的發展來看，以研究群眾的福利為著眼點只是最近的事，中國二千年來即已存在，只是缺乏運作的方法而已。

如果能把西方近百年來在社會科學方面所發展的實際運作的方法及架構拿來研究自己的社會環境，就成為中、西理論的融合。從賴博士的文章中看出，雖然我們幾千年來就是一個mass society，但由於脫離運作的範疇太久了，反而顯得不太重視平民的福利。陸教授的論文中，提到外國的福利制度，好像從個人的頭髮到腳毛都顧及到了。相比之下，頗令我們慚愧。目前，我們必須努力的是把民本的概念盡快運作化，從人民的基本的福利著手，例如：收入、財富、機會的平等、權力的分配等，這也是今後社會指標努力的重點。